



秦裕琨

Qin Yukun

秦裕琨

热能工程、燃烧学专家。1933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。195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。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。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发明了用于火力发电厂的风控浓淡煤粉燃烧技术,并研制了高效、低阻的煤粉浓缩器,强化了浓淡燃烧的作用。将“风包粉”和“浓淡燃烧”的思想相结合,达到高效、稳燃、低污染、防结渣和防高温腐蚀的综合效果。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,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此外,发电用煤矸石130 t/h流化床锅炉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,原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出版著作6部,发表论文百余篇。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我,1933年出生在上海。那时的上海是半殖民地社会。我家在富民路,属法租界,当时叫古拔路,古拔是中法战争时在镇南关(今友谊关)被清朝黑旗军打死的法国将军。那时巡捕房(今公安局)的头儿是法国人,雇佣了一批越南人当警察,叫安南巡捕。从我家往北不远,过延安路(当时叫福煦路),就是英租界,雇佣了一批印度锡克族当警察,头上缠着橘红色头巾,叫红头阿三。明明是中国的土地,却是外国人说了算。

1937年,我4岁,抗日战争爆发,我还记得那年冬天,舅舅领着一家老小从南京逃难到我

家的情景,不久发生了南京大屠杀。我的伯父住在家乡扬州,有一天上街,遇到了日本人拉夫(抓壮丁),从此音信全无。我有个亲戚住在虹口区,到他家要经过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,要从马路对面走,还必须对大门鞠躬才能过去。我们宁可绕个大圈子,也不从那儿走。

1945年抗战胜利,欣喜若狂。听说离家不远的锦江饭店来了中国兵,和一些小朋友到那里去看,坐在马路对面,看到有两个中国兵站岗,头戴钢盔,手持冲锋枪,真威武,越看越高兴,终于看到中国自己的兵了。中午饿了回家吃饭,吃完饭还去看,看不够。但是,好景不长,接收大员成了“劫”收大员,腐败黑暗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。父亲发了工资,必须立刻去买粮和生活必需品,剩下的换成袁大头(即刻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),否则就不值钱了。中国怎么办?

1949年,上海解放,我看到一个崭新的政权,中国有了希望。1950年考入交通大学机械系学习,由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,1953年提前一年毕业。毕业分配时可以填报志愿,我的志愿是东北、西北、华北,目的就是建设祖国,当时的重大建设项目主要在北方。最后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作研究生。

1953年9月初到了哈尔滨。第一年在预科学习俄语,一个班三十余人住一间寝室。第一次见到了高粱米饭和苞米面饼,说实话,并不好吃,但心情非常愉快。那时哈尔滨有很多国家重点建设工程,过几天这里建起了一座工厂,那儿又多了一座厂房,祖国建设日新月异,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也就算不了什么。1954年下半年苏联专家到校,将我分配到锅炉制造专业,我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,不知道锅炉是什么,既然让我学,国家肯定有需要。一方面学习,一方面教学生,开始了教学生涯。第一次上课,不能讲得太快,因为后面的内容还没学呢。这样受到很好的锻炼。1956年,研究班毕业,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任教。这一干,在哈尔滨

就工作了五十多年。

1956年,苏联专家走了,就靠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支撑着专业,很累,但很舒畅,提高也很快。但好景不长,1957年,反右开始了。因为替同学打抱不平,差一点当上右派,自己也无法理解,我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?但有一个信念,作为一个教师,教好书总没有错。于是,白天接受批判,晚上备课写讲义干到深夜。这本讲义在1963年正式出版为教材,这是国内本门课程的第一本教材。

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我才三十多岁,也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又是“漏网右派”。这些年,我下过乡,种过地;到过林区,伐过木;也到过街道小厂,甩大榔头,打过铁。虽然浪费了一些时间,但也有好处,让我了解了社会,了解了中国国情。后来,开始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,又可以做技术工作了。主要是参与当时打倒“煤老虎”的活动,也就是改造旧式锅炉。有两件事值得一提:一是替学校锅炉房设计了烧褐煤的带后置旋风旋尽室的流化床锅炉;二是为省革命委员会(省政府)设计了自然循环热水锅炉,这在当时都是首例。这两件事都是有风险的,如果到采暖期供不上热,学校上不了课,或是省革委不能办公,那都将是“政治事件”,后果不堪设想。“文革”以后,这两项技术都列入国家“六五”科技攻关,并得到推广,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。这样,十年动乱,也没有白过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。我虽早已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,但在那些年的气氛下,无法提出入党要求,1981年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这时期,在研究工作方面还做了一件事。70年代末上海锅炉厂生产了几台130 t/h流化床锅炉燃烧煤矸石,两台装在广东,两台装在黑龙江滴道煤矿。由于在“文革”期间是根据长官意志设计制造的,缺乏科学根据,投运后出现严重问题,广东的两台已报废,滴道电厂的两台虽然问题也很严重,但如报废,将损失近亿元投

资,电厂工人将面临失业,电厂提出了要“强发电、求生存”的口号。设计部门和电厂对问题各持己见,而当时在国际上这样大型的燃烧煤矸石的锅炉也是没有先例的。80年代初,由国家科委组织攻关,邀请我作为第三方参加工作。有人说,已得不治之症,我觉得需要先做工作,再下结论。建议组织大型实验,查明问题的原因。国内有好几个单位对此感兴趣,主动参与了实验工作。终于找到了原因,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产生了。最近了解到这两台锅炉至今还在运行,取得很好的效益。这个项目获得部级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。

从1980年开始,承担行政工作了。先当教研室副主任、主任,1987年任动力系主任,又兼党总支书记、兼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(院长是当时第一汽车厂厂长),1990年任学校副校长、主管教学工作,直到1994年61岁退出行政职务。由于学校的工作是培养人,始终将学生工作、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,千方百计调动老师和学生的教和学的积极性,建立并不断完善教学质量的监控和激励机制,推进教学改革,虽然费了不少精力,还是值得的。

特别是到学校任职以后,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精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1987年,我提出了煤粉燃烧技术方面的新设想。首先在校内实验台上研究,只有很少的经费,条件很差,靠几个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克服很多困难,终于证明这个设想是可行的。为了找到一个中间实验电厂又费了很大精力,最后找到“北大荒”农场的自备电厂,在一台小型电站锅炉上完成了实验。这期间我只能利用晚上和休息时间作一些工作,有时甚至要“打通宵”。

1994年61岁时高高兴兴地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,全身心地投入业务工作。科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快的进展,应用此项技术的发电机组,从6 000千瓦发展到60万千瓦,技术也得到完善和发展。2000年,这项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,在人民大会堂朱镕

基总理亲自给我颁发奖励证书,同时也获得黑龙江省的奖励。我常对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说,我欣赏一句广告词:“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”,如果认为最好了,离开被淘汰就不远了。必须不断改进、不断发展,直到现在,还在提出新的要求。从开始重点解决经济性、可靠性,到现在着重解决环境保护,降低污染物排放,在煤粉燃烧技术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由于在我国能源及与其相关的环境问题形势非常严峻,需要做的事情很多,所幸我所在的团队已

逐步发展壮大,有一批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努力工作,相信他们会为我国的能源事业做出贡献。

回顾一生,风风雨雨,经历过日伪和国民党的统治,又受到极“左”路线的折腾,走到了今天,赶上了中国多年来发展的最好机遇。深感一个人的命运,无论愿意不愿意,总是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,国家受难,个人没有幸福可言,国家昌盛,个人才能有所作为。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。